

傳播學研究概觀

陳國明 *

壹、前言

經過多年的折衝樽俎，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演辯傳播學會（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終於成功地經由七千多名會員投票，去年（1997）通過了把名字更改為國家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一個影響深廣的學會名字的變更，不僅反映出學會自我認同方向的再確認，同時也顯示了此領域的研究方向和教育內涵的轉變。傳播研究的起源雖然可追溯到二千餘年前亞里斯多德的《Rhetoric》一書，但是傳播學真正成為一個專門研究的領域，卻是二十世紀之後的事。傳播學的領域包含甚廣，其中幾個主要的學科包括：公共／修辭傳播、人際間傳播、小團體傳播、組織傳播、電訊傳播（telecommunication）、和文化／國際間傳播（陳國明，1988）。本文就從研究的角度，來約略描述傳播學研究史，並進一步概括地來談談傳播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最後則在結論裡提及傳播學研究未來的可能發展。

貳、傳播學研究簡史

依Delia（1987）的說法，傳播學的研究和教育，其實是從二十世紀才真正在美國起步的。十九世紀的三大社會變遷，包括工業化、都市化、和教育的普及，直接或間接助長了傳播研究的形成。工業化帶來了印刷術的速度和品質；都市化造成了人口的集中；教育普及促進了傳播媒介在數量上的增加。這個趨勢把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從農業轉化成現代化（工業化）社會的生活方式。報紙的發行量因人口集中和工

* 陳國明為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系副教授。E-mail:gchen@uriacc.uri.edu

業技術改進，而大幅增加；加上教育的蓬勃發展和其他閱讀傳播媒介的需求，傳播工業、商業和各種產品在二十世紀初葉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隨著傳播業的發達，傳播研究也開始萌芽。

在1900到1940的草創期間，傳播研究的旨趣偏重在五個方面：(1)傳播和政治有關的問題，(2)傳播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3)傳播的社會心理分析，(4)傳播和教育的關係，和(5)商業化的傳播研究（Delia, 1987）。在這期間，並沒有所謂的「傳播研究」或「大眾傳播」等用語存在。大部份有關傳播的研究，幾乎都隸屬於傳統的科系，特別是社會學。雖然演辯學系（speech department）為了教育的需求，早在1910年代即已設立，但是卻只注重實用性的口頭溝通技巧的傳授而已。

「傳播研究」等名詞，一直等到1940到1965年的傳播研究鞏固期才出現。這期間Hovland與Lazarsfeld所領導的兩大學術集團主控了傳播學的研究方向。Hovland由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態度改變，和Lazarsfeld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大眾傳播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並進而拓展了國際傳播研究的領域。他們給傳播研究奠立的基礎，實居功厥偉。不過，由於此等研究完全依賴社會科學方法，因此忽略了其他的領域，而且造成了與教育之間脫節的現象。因此在1965年之後，為了職業與大學教育的需求，新聞系與演辯系乃攜手整合了傳播學的研究領域（Delia, 1987；陳國明，1993）。

從傳播研究的鞏固期到建立起一門獨立學科的過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把傳播研究整合納入到新聞學和演辯學兩個領域裡。這就是1965到1980年的傳播研究的整合期。

傳播科學的研究注入新聞學領域之後，也出現了一些衝突。因為傳統上，新聞學以基礎教育的職業訓練和質化的研究為主，傳播學則以量化研究為主。但是兩個學科相互滲透之後基本上仍能和平共存。這在1960年之後的教科書質化、量化、職業化、和學術化等主題均勻討論可以看出來（如Peterson, Jensen, 和Rivers於1965年出版的"The Mass Media and Modern Society"）。演辯系也因為吸取了傳播的研究而起了結構性的變化。演辯學的傳授早在美國殖民時期就已開始，到了二十世紀初演辯學紛紛脫離英文系而自成一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演辯學者創立了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 (NAATPS) 之後，演辯學和英文系乃完全脫離了關係。隨著此協會的成立，幾本主要的專業期刊也跟著發行，諸如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Speech Monographs (即現在的Communication Monographs)，Speech Teacher (即現在的Communication Educator)，和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研究範疇的增改，NAATPS也改

成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SAA），再由SAA變成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SCA）。如今又改成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以顯示其包容性。

在一九四〇年底，一些演辯學學者聯合組成了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NCCS），這個學會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的前身。此學會發行了三本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較近的Communication Theory。Communication Yearbook亦由ICA發行。NCA和ICA兩個學會成了（演辯）傳播學的主幹。傳播學研究也從此建立了如前所提，包括演辯學（Speech）和傳播學（Communication）兩大領域的學科。

演辯學和傳播學的整合，在八〇年代之後，因社會的變遷而達到空前的發展。研究的內涵與方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樣和多元。各領域與學派之間在相爭、相輔、與相成的互動之下，形成了一幅百花齊放的高度動態性的圖畫。這個多元內涵與研究方法帶來的各領域之間的拉鋸戰，至今仍持續進行著。從此圖畫我們可以概括地看出，在內涵與理論方面，傳播學研究汲取了來自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與哲學的部份精華。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深受這些學科的影響，而使得質化與量化等多元性的研究方法同時並存在這個領域裡（Cohen, 1985; Pearce, 1985; Littlejohn, 1982, 1995）。

參、傳播理論和傳播研究方法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傳播學的研究在理論和方法方面，雖然如今仍然處於一個複雜多樣的局面，但若仔細觀之，我們可以發覺傳播學這個學門已逐漸建立一個具有共同信仰的自我認同身份。對傳播學較有凝聚和連貫的共識也漸趨形成。在此讓我們從傳播學研究的世界觀或概念模式（paradigm）的角度，來扼要地說明當今傳播學的共識。一個科學的世界觀或概念模式通常包含四個要素：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形上論（metatheory），與方法論（methodology）（Smith, 1988）。

一、本體論（ontology）

從傳播學的角度，本體論意指傳播者或傳播本身的本質為何。換句話說，傳播行

為是一種出自自我意志或完全受制於社會、環境或文化的活動呢？很明顯地，八〇年代之前的傳播研究幾乎是機械論（mechanism）主控的天下，hypodermic needle或bullet theory就是這種視傳播為單向影響的論點的最佳例子。之後，視傳播行為為一種自發性、有目的性，而非受制於外在因素的行動論（actionalism）慢慢取代了機械論。建構理論（constructivism）（Delia, 1977）和通則理論（rule theory）（Cushman, Valentinsen & Dietrich, 1982）的興起可資為例。在此同時，也產生了承認傳播行為無法免除外在環境影響的行動論，Pearce, Cronen and Harris（1984）的contingency rules theory即是兩例。

經過這三方面的發展，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當今傳播學者基本上同意傳播行為的本質應該包含四個要點（Chen & Starosta, 1998）。第一，傳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現象（holistic phenomenon）。傳播本身就是一個參與者表達自我認同和接受肯定對方認同的過程的關係網。第二，傳播是一個社交實境（social reality）。它是一個參與者經由語言與非語言象徵符號的互動，而建立出一組共同分享之意義的過程。第三，傳播是一種連續發展的過程（developmental process），如同陰陽互動生生不已，變遷與轉換。最後，傳播是一個亂中有序的過程（orderly process），就好像日月之更迭，潮汐之漲落，有其規則形態可尋，而非混亂不可預測。

二、認識論（epistemology）

認識論旨在討論傳播探究的本質為何。也就是問：傳播學研究的適當方法是什麼呢？Pearce, Cronen & Harris（1982）和Smith（1988）認為，影響傳播學研究的認識論，包括了幾種。第一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主張人類創造性思考，是揭發具有邏輯結構的經驗世界的最佳方法。Chomsky（1966）的generative或transformational linguistics和Burke（1946, 1950）的戲劇性修辭理論（dramatistic theory）為典型的例子。第二是理性實證主義（rational empiricism）。主張前述理性主義對人類的理解，必須進一步建立在經由觀察所得之資料的印證上。Grice（1975）的logic of conversation理論即是一例。當今幻想主題分析（fantasy theme analysis）等類的修辭批評皆具有這種色彩（Smith, 1988）。第三是機械式的實證主義（mechanistic empiricism）。主張知識來自儘少受到理性思考干擾的經驗觀察。早期的傳播研究和五、六〇年代的說服研究，以及其他如互動分析（interaction analysis）學派也歸於此類（e. g., Feldstein, 1972; Stech, 1975）。

第四是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以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和操作

主義（operationalism）為基礎，主張一個客觀真實的世界存在於吾人的理性思考之外，只有經由經驗觀察才可得知。但經驗世界可觀察的諸現象只具有可變之相依關係（correlation），而非因果關係。邏輯實證論影響傳播學研究甚鉅。從傳播學成立之初到六〇年代，幾乎是邏輯實證論的天下，尤其是Hovland學派所建立的說服與態度轉變的研究，更執這個範疇的牛耳。邏輯實證論的影響力，至今仍然相當强大。但比起早期雄霸整個學界的情形，我們發覺八〇年代之後，因受其他思潮的挑戰，其風采已漸漸褪失。

第五是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主張真實世界是經由個人的觀察所建構出來的，而且個人所見所解釋的現象世界是一個整合的全體。換句話說，個人的心智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佔據著一個積極投入的角色。建構主義可說是折衷了科學經驗主義（humanism）的思潮（Smith, 1988），其領域包括了交談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內容分析、和修辭批評等解釋（interpretive）方法，至於Delia的developmental constructivism與Pearce的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theory，也屬此類。建構主義在八〇年代之後，持續對傳播學研究發揮強大的影響力。不過，依Smith（1988）的說法，盛行於當代的思潮，應該是所謂的建構主義，認為過度強調個人解釋過程的主觀性導致了合體性（collective）學術研究的無法落實，因此主張以相互主觀（intersubjectivity）來解釋傳播現象。

最後，視傳播為一開放系統，側重份子之間互動與關連的一般系統理論思潮（general system theory），三十年來也持續影響著傳播學的研究。雖然此思潮一直未成主流，但其啟發性甚強，應用性也很廣，很可能為傳播學研究闢出一條新路（Fisher, 1978; Infante, Rancer & Womack, 1977; Littlejohn, 1995）。Cushman and Craig（1976）的self-conception approach, Kincaid（1987）的convergence theory, Millar and Rogers（1976; Rogers, 1989）的relational approach, 和Watzlwick, Beavin, and Jackson（1967）的interactional view皆是此派裡的佼佼者。

三、形上論（metatheory）

形上論意指對理論本質的信仰。什麼樣的理論解析（theoretical explanations）可適用於傳播行為呢？一般而言，研究者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觀點，基本上就已決定適用於該研究者的理論解析。大體說來，影響建構傳播理論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定則法（the laws approach），通則法（the rules approach），與系統法（the systems approach）（Bormann, 1980; Stacks, Hickson & Hill, 1991）。

定則法通常擁抱決定論或宿命論的本體觀點，在認識論方面則依靠機械式的實證論或邏輯實證論。如前所述，因定則法的理論建構過程，主張傳播行為的因果關係，且把人視為傳播過程中的一個被動與受制於外力的物體，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人性自我意識的高漲，它的魅力與說服力已大為減低。定則法為理論建構，基本上是試著使用歸納或演繹的方法，來陳述一種在某種情況之下為真的普遍性命題。這種「在某種情況下，若A則B」的定則法基本論題，深受時空限制，因此用來解釋傳播行為，不免顯得僵化。不過，定則法的影響力雖然日漸式微，它對傳播學研究的發展與貢獻（如Berger and Calabrese的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1975），具有不可抹滅的歷史地位。因此當今仍不乏傳播學者（e.g., Miller & Berger, 1978; Poole & Hunter, 1980; Seibold, 1980）繼續鼓吹定則法的使用。

通則法在本體論方面通常採用行動論的觀點，在認識論方面則歸於建構或建構唯實主義。此法試著用一種較正式或鬆散的邏輯思維，來解釋為什麼人們會產生這種或那種的傳播行為（Stoks, Hickson & Hill, 1991）。經由這個過程，即可發現一組用來解釋為何在某種情況之下某某人們會有某種的傳播方式的通則。這種通則是可變的，不像是「若A則B」的定則。通則法做如此的陳述：「A認為經由B，C就會發生，因此A決定做B」（Cushman & Pearce, 1977; Cushman & Whiting, 1972）。前面提及的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與Goffman (1959) 的dramaturgical analysis是運用通則法建構傳播理論的好例子。通則法是定則法的一個強烈的對比，定則法失之過僵，缺乏彈性，通則法則失之含混籠統，不易回答一組通則構成的因素。不過，因局勢所趨，此法應用在傳播學研究上，大有超越定則法，而成為當今顯學的趨勢。

系統法是一相當龐雜而且尚未完全成形的形上理論（它同時也可視為認識論）。它主要包含結構理論（structural theory）和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系統法把傳播行為視為一整體現象，並且進一步探索傳播本身各份子之間的關聯。系統法的主要字彙（e.g., environment, feedback, openness, hierarchy, input, output, interrelationship, equifinality, and balance），可以很容易用來解釋傳播學各個不同領域的論題。其啟發性之強自不待言，但也因為它的籠統性，尤其在方法論方面的不足，傳播學者要能經由系統論的應用而建構出高信度的理論，恐非一蹴可及之事。不過，從當今傳播學者對系統法持續保持興趣的現象看來，系統法將來在傳播理論的建構上應該會有一番作為。

四、方法論 (methodology)

綜觀半世紀來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我們可以發覺研究方法隨著對傳播這個概念的意義、過程、和理論認知的變遷，有著很明顯的更迭。最明顯的改變是由五、六〇年代實驗方法學操縱的單元取向，轉化為近年來的方法多元取向。再者就是傳播學者逐漸發展出一些屬於傳播學科自己的研究方法（Smith, 1988）。

為討論方便起見，在此姑且把研究方法區分為量化與質化兩類。研究方法的質化、量化之別，並不只意謂著資料（data）的質、量之別而已。兩者之間的差別主要是紮根在前面所談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形上論信仰上的異同。量化的研究方法由功能型模（functional paradigm）引導，崇信決定論、實證論與定則法。質化的研究方法由詮釋型模（interpretive paradigm）引導，較偏向於建構論與通則法（Ting-Toomey, 1984）。

若依類別，量化的傳播學研究方法與主要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無異，包括了實驗方法與調查法。質化的傳播學研究方法以修辭批評（rhetorical criticism）為主。修辭批評有歷史批評法（historical criticism）、新亞里斯多德批評法（neo-Aristotelian criticism）、女性主義批評法（feminist criticism）、幻想主題批評法（fantasy theme criticism）、比喻批評法（metaphoric criticism）、戲劇論批評法（dramatic criticism）、敘事批評法（narrative criticism）、與類型批評法（generic criticism）等等（張榮顯，1998; Foss, 1989）。至於內容分析、民族誌法（ethnography）、互動交談分析（interactive discourse），與敘事言說（narrative discourse）等方法，則依研究的需求，可量化亦可質化（Frey, Botan, Friedman & Kreps, 1991; Rubin & Babbie, 1997）。

若以當代傳播學研究而言，在研究方法方面則已顯示出幾個趨勢（陳國明，1993; Chen & Starosta, 1998; Smith, 1988）。第一，科學與人文方法的合流。傳播學者已逐漸發現質化、量化研究方法並非必須敵對不可，因為同一研究內同時使用質、量方法相互印證，常常更能捕捉到傳播行為的豐富性。第二，傳播學者漸趨使用傳播學獨創之研究方法。七〇年代之後，越來越多學者偏愛詮釋型模的相關方法，來勾勒傳播內涵的意義與行動。第三，在研究場域（research setting）的選擇方面，傳播學者也漸漸以自然研究法（naturalistic research）取代依賴嚴格環境限制的實驗方法。第四，在研究設計方面，橫斷法（one shot/cross-sectional methods）的使用已不再獨占，有些傳播學者已採用縱貫法（longitudinal designs）的研究。最後，在測量分

析方面，為了更加了解傳播本身的複雜性，多變項分析法（multivariate analysis）的使用也已大量增加。

肆、結論

傳播學發展的過程是崎嶇的。它雜揉了不同領域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既屬科學又屬人文的學科，這種混合的現象造成了傳播學的兩個主要特色：內容龐雜和方法歧異。從正面觀之，這代表了傳播學研究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但是這種特色也正好顯示了傳播學研究的缺點（Zarefsky, 1995）。因為它的包容性，諸如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亦同時把「傳播」視為它們研究的一個概念，結果造成這幾個學科不願意承認傳播學可以成為一個獨立領域的事實。多年來傳播學尋求自我認同的過程可說是辛苦備至，這從歷年來此學科最主要的學會（NCA）名稱的數度更改可以看出。如今傳播學雖然已經成為一個獨立而且專門的研究學科，但是如何改變其他領域對傳播學的觀念和尋求共同的合作，仍是未來有待努力的方向之一。另外，傳播學的包容性也造成了因內容過廣而無法有效定義其焦點研究的現象，從Infante, Rancer 及Womack (1997) 和Littlejohn (1995) 的書上可以看出，傳播研究的概念和理論幾乎是無所不包。這種包容性造成了自我認同的困難，這也是傳播學至今一直沒有發展出一套整合性與有系統的傳播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原因。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建立乃是一門學科獨立的要素，這方面的嘗試也是傳播學者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

最後，除了上述的變遷之外，我們當對全球化社會潮流給傳播學研究可能帶來的衝擊，有著深思與對策（陳國明，1998；Chen & Starosta, 1996）。全球化社會潮流在新社區意識的重建，文化認同與文化多元之間的拉鋸，以及全球化媒體的衝擊各方面的影響，無疑將左右著整個傳播學領域未來發展的方向。這個影響將涵蓋傳播學教育的設計、研究方法的取捨與學生就業的訓練。若把這些問題加上傳統上傳播學科複雜多元所帶來的困境，身為傳播學者與學生，我們知道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呢！

參考書目

陳國明（1998）：〈傳播與全球化社會：研究綱要〉，《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發表。台北，台灣。

陳國明（1993）：〈傳播研究的過去和現在：為文化間傳播學定位〉，《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文發表。台北，台灣。

陳國明（1988）：〈論臺灣傳播教育之缺失〉，中央日報海外版12月10日，第八版。

張榮顯（1998）：〈廣告修辭研究初探〉，《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發表。台北，台灣。

Berger, C. R., & Calabrese, R. J. (1975). Some explanations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99-112.

Burke, K. (1946). A Grammar of Mo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urke, K. (1950). A Rhetoric of Mo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hen, G. M., & Starosta, W. J. (1996).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synthesi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 353-383.

Chen, G. M., & Starosta, W. J. (1998).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Chomsky, N. (1966).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Cohen, H.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 W. Benson (E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p. 255-281.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ushman, D. P., & Craig, R. T. (1976).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terpersonal implications. In G. Miller (Ed.), Exploration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37-58. Beverly Hills, CA: Sage.

Cushman, D. P., & Pearce, W. B. (1977). Generality and necessity in three typ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Special attention to rules theory. In B. D. Rube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 173-182.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Cushman, D. P., Valentinsen, B., & Dietrich, D. (1982). A rules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F.E.X. Dance (E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90-119. New York: Harper & Row.

Cushman, D. P., & Whiting, G. C. (1972). An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 Toward consensus on rul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 219-220.
- Delia, J. (1977).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3: 66-83.
-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and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eldstein, S. (1972). Temporal patterns of dialogue: Basic research and reconsiderations. In A. W. Siegman and B. Pope (Eds.), Studies in Dyadic Communication, pp. 91-114. New York: Pergamon.
- Fisher, B. A. (1978). Perspectives on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Foss, K. (1989). Rhetorical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 Frey, L. R., Botan, C. H., Friedman, P. G., & Kreps, G. L. (1991). Investigating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Anchor.
- Infante, D. A., Rancer, A. S., & Wowack, D. F. (1997). Build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 Kincaid, D. L. (1987). The convergenc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D.L. Kincaid (Ed.), 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pp. 209-222. San Diego, CA: Academic.
- Littlejohn, S. W. (1982). An overview of contribution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ther discipline. In F. E. X. Dance (Ed.), Human Communicaton Theory, pp. 243-285. New York: Harper & Row.
- Littlejohn, S. W. (1995).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Millar, F. E., & Rogers, L. E. (1976).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G. Miller (Ed.), Exploration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87-203.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illar, F. E., & Rogers, L. E. (1987) Relational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dynamics.

- In M. Roloff and G. Miller (E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New Direction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iller, G. R., & Berger, C. R. (1978). On keeping the faith in matters scientific.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2: 44-57.
- Pearce, W. B. (1985).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In T. W. Benson (E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p. 255-281.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Pearce, W. B., Cronen, V. E., & Harris, L. M. (1982).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building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F. E. X. Dance (E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1-41. New York: Harper & Row.
- Peterson, T., Jensen, J. W., & Rivers, W.L. (1965). The Mass Media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Poole, M. S., & Hunter, J. E. (1980). Behavior and hierarchies of attitudes: A deterministic model. In D. P. Cushman and R. D. Mc Phee (Eds.), Message-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 Theory,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pp. 245-271. New York: Academic.
- Rubin, A., & Babbie, E. (1997).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Work. New York: Brooks/Cole.
- Seibold, D. R. (1980). Attitude-verbal report-behavior relationships as causal processes: Formalization, test, and 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s. In D. P. Cushman and R. D. McPhee (Eds.), Message-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 Theory,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pp. 195-244. New York: Academic.
- Smith, M. J. (1984). Contingency rules theory, context, and compliance behavior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 489-512.
- Smith, M. J. (1988).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Belmont, CA: Wadsworth.
- Stech, E. L. (1975). Sequential structure in human social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168-179.
- Ting-Toomey, S. (1984). Qualitative research: An overview. In W. B. Gudykunst and Y. Y. Kim (Eds.), Method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69

• 新聞學研究 • 第五十八期 民88年1月

-184. Beverly Hills, CA: Sage.

Watzlawick, P., Beavin, J., & Jackson, D. (1967).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in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Zarefsky, D. (1995). On Defining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J. T. Wood and R. B. Gregg (Eds.), Toward the twenty-firt century: The future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An Overview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Guo-Ming Chen *

ABSTRACT

The name change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 to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not only reflects the effort of the discipline to reassure its identity, but also shows the reorien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o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ren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ccinctly examine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potential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s also discussed.

* Dr. Guo-ming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